

“美标”失效了吗？当代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与美国文化的复杂态度

李文堂教授

前些年，中国许多公共场合和家庭装修流行一种“美标”（American Standard）洁具，如“美标”龙头、“美标”抽水马桶之类，听说质量很好，连我们中央党校的办公大楼都安上了“美标”。不过最近又听说有点过时了，因为有点滥了，而且现在有了许多新的进口洁具，德国的、法国的质量也很好。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有另一种“美标”似乎也开始失效了。不过这种“美标”不是洁具，而是美国文化。

美国人常常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当作衡量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标准和规范，高举“美标”充当“世界警察”，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则拿着“美标”来检讨自己，作为文化批判与文化改造的标准。

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美标”的形成有着很长的历史。大家知道，中国现代职业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基本上是留学生的文化传播史。由于留学地域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其中留美生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尤为显著。美国是中国最早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西方国家。留美生对美国文化的认知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以说，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美国文化了解，因此，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折射出来。“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文化学人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概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理念。这一理念虽然是留英学生严复译介西学的文化后果，但它的催生与传播也得力于留美生。1915年在康奈尔、哈佛等校就读的留美生成立的“科学社”对《新青年》杂志力倡科学的宗旨就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生直接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 Dewey）哲学引入中国校园，使美国文化中的实验主义科学观、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开始影响中国知识界。20年代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生及其他杜威学说信奉者成立了中国新教育促进社，创办《新教育》杂志。1922年教育法案更仿照美国教育制度，对中国教育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一时间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一道，成为颇富吸引力的时髦口号。在民主理念方面，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多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社会建制。对美国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使胡适最

终选择美国为他的归宿地。可以说，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美标”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确立起来的。

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界对“文革”的反思与对苏联体制的怀疑使美国的文化标准重新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中觉醒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燃起了对西方文化的热情，知识界大量译介西方文化经典，力图为被忘却了的五四启蒙理性提供文化土壤。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启蒙理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思潮被一古脑儿地端到了读者面前。它们都成了知识界反传统、反旧体制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一个被封闭得太久而缺乏基本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知识界，除了“拿来主义”就谈不上其他可能的文化选择。像五四时期一样，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表现出巨大的同质性，基本上缺乏理性的分析和独立的洞察。他们的知识立场是共同的。在他们眼里，“西方”虽然不是晚清时期一个抽象的地理意象，但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文化意象。许多知识分子沉浸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的美妙图景中，而这种现代性的典范就是“伟大的美国”。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是，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对于一个做着现代化梦想的民族来说，美国自然是一个强势的

权力话语。在很多知识分子眼里，美国是一个科学昌明、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社会自由的国度，是先进的西方文化典范，也是中国现代化学习的楷模。深受“文化热”影响的知识青年开始编织起自己的“美国梦”。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以各种形式连续不断地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是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

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然而又心浮气躁的启蒙时代！激进主义情绪激昂着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与五四时期一样，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很快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关怀和文化批判。从倍受知识界关注和大学生欢迎的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到电视片《河殇》，就可以看出其中文化情绪的演变轨迹。强烈的文化自卑、自我憎恨与走向世界的迫切愿望，使他们对中国社会真实的历史，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改革开放的复杂局面有所失察。现实反复地证明，文化反思一旦变成了政治变革的总动员，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不能自己把握了。

政治经验告诉他们：现代化道路是“欲速则不达”。当92年邓小平果断地启动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真的开足马力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知识界在现代性面前就开始迟疑了。这种迟疑也发生在亲西方、特别是亲美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置身海外，亲临现代

性的双刃剑的时候，当他们从海外归来被自由市场淹没的时候，当他们在娱乐和消费文化面前感到失落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成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发觉自己被抛入前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相互缠绕又相互冲突的复杂而尴尬境地，开始去辨析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在鲁迅式的启蒙主义那里是不被察觉的。在这样一个令人窘迫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告别了天真的启蒙主义，知识界也出现类似五四后期的思想分化。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对中国历史的自我说明、对人文精神与道德的重建，是9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三种主要动机。这三种动机使所谓“国学热”在艰苦的学术环境里一再升温。当然，这一现象也是海外新儒家推波助澜的结果。“国学热”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儒家资本主义”、“亚洲价值”这些舶来品一度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主观上试图论证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客观上则强化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后冷战时代亚洲文化的自我肯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学热”虽然在金融风波后已经降温，但它产生的另一后果却仍有时效性。那就是中国科学本土化意识。由于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现实问

题变得越加复杂，许多知识分子的中国问题意识大大增强。对西方社会、文化了解得越多，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也就看得越清楚。他们意识到，无论是“社会形态五阶段论”还是自由主义话语，都无法贴切解释中国过去的历史，也无法贴切解释当代的现实。现代性、历史进化论、理性主义、市民社会、自然法、民族-国家等等这些概念都不合中国的历史语境。他们试图摆脱五四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语言和分析框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支解，从本土的历史语言中找到当下的自我说明。他们拒绝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而倾向文化相对主义。然而，就在这种本土文化意识复苏的时刻，最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从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了更有魅力的理论资源。

新保守主义告别了一切革命，后现代主义告别了一切启蒙。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世俗化方向，一边拥抱着大众文化，一边嘲笑启蒙主义已经不适宜。他们并没有能力去清理现代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遗产，就把现代性当作西方的一个神话来质疑，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从法国后现代理论那里很快走到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中。他们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霸权，反对启蒙主义的宏伟叙事，但同时又虚构了含混不清的

“中华性”^① (Chineseness) 与之对抗。当他们用福柯 (M. Foucault)、德里达 (J. Derrida)、萨义德 (Edward W. Said) 的理论去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 就与中国“新左派”的文化立场合流了。

中国知识界这几年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群体实际上极其庞杂, 不但学科背景也不同、思想资源不同, 相互之间也没有统一观点, 自身的立场也不稳定。许多人被称为“新左派”的人也不认同这顶帽子, 但是他们仍然有一定的学术圈子, 聚集在一些被许多人认为左倾的杂志^②、会议和网站周围。“新左派”思想在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但在文学批评背景的知识分子那里, 尤为活跃。他们不但有五四以来激进的批判传统, 也一直追随着西方左派的批评轨迹,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 (Birmingham School), 从詹明信 (F. Jameson) 到华勒斯坦 (I. Wallerstein)。他们继承了文学左派的批判的现实主义, 甚至也染上了民粹主义的浪漫色彩^③。而在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 “新左派”

的言论更惊世骇俗。他们“重新发现”了晚年毛泽东, 发现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④在现实问题上, “新左派”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弱势群体的状况, 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担心跨国资本在中国的渗透和扩张将带来新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因此, 他们不相信现代性和全球化会带来世界大同的神话。^⑤

90年代的学术倾向从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新左派”的变化表明, 在中国社会大踏步走向全球化格局的时候, 知识界却悄然聚集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批判力量, 它批判西方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全球化。这种批判仿佛是世纪末的一场集体忏悔, 目标是要拨开一个世纪的迷雾, 洗去百年的悲情, 而当务之急是要把这笔帐算在美国人头上, 因为美国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从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 中国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诉求, 已经使中国文化走到了美国化的危险门槛。在不同师承又相互关联的学理背景下,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

《切·格瓦拉》(Cheguevara)。

^①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 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陈晓明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钟山》1994年第1期;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②例如北京的《读书》、海南的《天涯》。

^③指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

^④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 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

^⑤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批评矛头指向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霸权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例如，高科技不过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理性，民主与人权也常常服从于国家利益，好莱坞的大众文化则是推行消费主义的话语霸权，而这一切都构成了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注定领导”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失去了昔日人道与和平的美丽光环，而暴露了现代性欲望和权力的本质。尼采（F. Nietzsche）、马克思、福柯（M. Foucault）教会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洞察。

可以说，当代中国知识界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对待美国的文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美国标准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也不是最好的标准。这种改变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压力或者意识形态的导向，而是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实际生存境遇重新考量的结果。虽然邓小平曾经一再告诫说，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不管这一告诫包含了多少真理，今天许多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并不会像从前那样对此言是言非了。他们已经非常善于谨慎地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实际上，在当代中国，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已被边缘化了。他们的思考与表达的冲动基本上来自自身环境的压力，来自解读和回应当下社会的需要，来自

民间生活、土地与民族的依托。他们的立场、观点和分析工具都不是民族主义的，但给民族主义释放出一个广阔的表达空间。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一旦出现，他们就和民族情绪相汇在一起。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种种辩护都非常苍白。申奥的失败、银河号事件、驻南使馆被炸、撞机事件一次比一次深深地伤害了中国老百姓的感情，而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一次比一次地伤害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曾经倾注了太多感情，投放了太多期望，把她看成是现代文明的使者，民主与尊严的象征，而现在，他们的“美国梦”一点一点被撕毁了。美国一方面以民主自由价值自居，另一方面随处表现得霸道、傲慢与偏见，大大激怒了中国人，激发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中国可以说不》^⑥就是这种情绪的赤裸裸表达。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并不代表知识界的严肃思考，而只是几个青年人成功的商业炒作，那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⑦则主要是几位旅美学者对美国文化长期观察的结果。书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新闻媒体、好莱坞电影、畅销书、汉学等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批评了美国的东方主义的话语权力。

这种局面就把中国许多亲美的自由

^⑥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1996年。

^⑦ 李希光、刘康等著，1996年。

主义知识分子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对美国文化又爱又恨。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反思极权主义的时候，离开了卢梭、黑格尔的肯定的自由观，而更加接近英美否定的自由立场。英美的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引导着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视线。而现在，面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能说什么呢？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人说，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动摇我们对民主自由的美国的信念。美国没有联合国授权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当中又有人说，爱美国就要批评美国。钱理群，一位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终于站起来批评美化美国、拥抱美元的中国人。在美伊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知识界分裂了。一大批学者签署了反战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另一部分人则指责他们为“新左派”的表演，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他们都以中国知识界或社会各界之名，发表了立场截然不同而措辞针锋相对的声明，可是，代表知识界的究竟是谁呢？

中国知识界茫然了。而昔日的“美标”还有效吗？